

被镌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淮北汉画像石与“五个共同”

熊帝兵

历经两千年沧桑的汉画像石，镌刻着汉代淮北大地的社会百态，留存下早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历史印记。

淮北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我国汉画像石的核心出土地之一。境内出土了大量东汉石刻，犹如相机一般，以直观的图像叙事，定格了两千年前多民族共生、文化互通的鲜活场景。这些画像石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五个共同”的历史逻辑，是淮北各民族多元一体、交融共生最真实的实物佐证与图像呈现。

两汉时期，淮北隶属沛郡，位居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汇的前沿，是当时四方人口迁徙、族群往来的重要枢纽。特别是在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西北边疆部族与中原的交流日趋频繁。各民族纷纷内迁，或经商贸易，或献艺谋生，其中不少兄弟民族人员定居淮北大地，与本地民众杂居共生，开垦拓荒，共同开发建设，开启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

淮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留存了大量特征鲜明的胡人形象，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头戴尖帽、身着窄袖短衣，与宽袍大袖的汉族服饰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显著的民族特色。梳理淮北汉画像石题材可以发现，石刻既有民族交战的历史片段，也有和睦相处的生活剪影，更多的是各民族民众和平共融的日常图景，如胡人担任府邸门吏、宫廷乐伎、出行扈从等，深度融入汉代淮北地区的社会生活。较具代表性的是相山公园内水牛墓出土的胡人鼓吹仪仗图，整幅画面以胡人贵族群体为主体，系统呈现出行仗仗、弓箭习武、鼓吹奏乐的完整场景，是国内罕见的纯胡人主题汉画像石刻。

题材丰富的淮北画像石是汉代淮北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归附部族、西域商旅、游牧乐伎纷纷进入这里，扎根淮北。他们带来西域的畜牧经验、乐舞艺术与民族特产，与本地农耕文明、儒家文化、汉族民俗深度融合，共同拓展生存空间，共同繁衍生息，使这一区域愈发富饶安定。

仪仗、百戏、乐舞、工具等异域题材的画像石能够镌刻于世家祠堂、贵族墓室，结合水牛墓画像石的系统呈现，足以证明边疆族群已深度融入汉代淮北的上层社会，被纳入汉代礼制文化体系。

不同族群的民众在淮北这块土地上比邻而居、朝夕相处，在生产劳作中互帮互助，在生活习俗中相互借鉴，在丧葬实践中交错相间。淮北汉画像石遗存，正是大一统格局下各族民众归属中华、共同相处、共守家国的鲜活物证。

迁居内地的兄弟族群，主动接纳中原孝亲敬祖的礼制观念、厚葬习俗与社会伦理，将自身文化特质融入本土文明体系。本地汉人也吸纳异域文化元素，烧烤、牧羊、着装等丰富着汉族的生活方式，杂技、音乐、舞蹈等丰富着汉族的精神世界。各民族迁徙交往、共生共融，共同编织出完整厚重的中华历史脉络，淮北汉画像石正是这段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最生动的地方注脚。石刻中，各族民众同欢共乐、和睦共处的画面，彰显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博大胸襟。

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带有浓厚异域元素的画像石，均由本地工匠创作而成。工匠们将日常所见的异域风物、风貌、风情融入传统石刻艺术，不排斥、不扭曲、不割裂，兼容吸纳，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鲜明特质。

异域文化元素从未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不断融入、丰富、壮大中华文化体系，印证了灿烂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多元交融的硕果。石刻遗存深刻诠释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以石刻观精神，淮北汉画像石承载的包容和合、团结共生、守望奋进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淮北地区的画像石无声地书写着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书写中华历史的乡土篇章，记录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轨迹与族群互动，让碎片化的早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变得具象可感。淮北汉画像石不仅仅是优秀的艺术珍品，更是绝佳的文化样本。各族民众跨越地域与族群差异，共同认同大一统国家秩序、共同坚守中华传统伦理、共同追求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在长期

交往交流交融共生中，培育出休戚与共、命运相依的共同体意识。这份沉淀两千年的精神基因，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

知古鉴今，淮北汉画像石承载着厚重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天独厚的本土文化资源。当前，我们需深度激活其文化价值，深挖石刻背后的历史内涵，让两千年的遗存焕发新生。

首先，要深耕汉画像石的研究阐释。依托淮北市博物馆、南山汉文化博物馆馆藏资源，聚焦其中民族共生的特色题材，系统梳理本地早期民族交往交融历史，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石刻纹理，生动解读“五个共同”的深刻内涵，讲好淮北本土民族交融故事。其次，要创新文化传播方式。通过拓片巡展、专题讲座、短视频科普、校园宣讲等形式，推动汉画像石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读懂家乡石刻里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树立正确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后，持续做好汉画像石保护活化工作。加强汉画像石修复、拓片整理与数字化保护，优化展陈解读，深度挖掘其背后的共同体文化内涵，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充分发挥文物育人、凝心铸魂的重要作用。

石载千秋事，画润民族情。淮北汉画像石镌刻着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烟火过往，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与发展。一方方石刻，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家国、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明、共同培育精神的鲜活物证。深挖汉画像石中的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传承千多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精神力量，必将为淮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文化动力。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作者简介：熊帝兵，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兼）。

淮海烽烟凝众志 运河文脉润认同

——淮北“五个认同”的生成机理与实践路径

陈郑云

淮北兼具淮海战役主战场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枢纽的双重身份，革命烽火与运河桨声构成其双重文化基因。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背景下，淮北历史人文为“五个认同”提供了地方性知识支撑，深刻揭示了认同从地方历史实践中生长、淬炼与升华的内在机理。

一、淮海战役与“五个认同”的政治生成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决战。淮北作为主战场和总前委所在地，其历史实践为“五个认同”的政治生成提供了深层的地方性资源。从星火交织的家国同构，到民心向背的政党选择，再到革命胜利逻辑向建设道路的延续，淮北的历史人文呈现出“五个认同”从革命中生成、在建设中巩固的内在逻辑。

一是血与火中的家国同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淮北人民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展现出高度自觉的家国担当。支前群众提出“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的口号，“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好儿郎，送到部队上”的感人场面纷纷出现。这种“家国同构”的认同逻辑表明，伟大祖国认同并非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根植于人民对自身生存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高度统一的切身体会。

二是民心向背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生成，在淮海战役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验证。总前委驻濉溪县临涣，淮北一度成为淮海战役的最高决策中心和指挥中枢。从“支援前线”到“建设家园”，党的领导贯穿于淮北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这种从革命到建设的连续性实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认同在地方层面的完整叙事，深刻揭示了政党认同的生成机制：它不是外在宣传的结果，而是人民在切身利益获得感中形成的自觉政治选择。

三是革命建设的道路延续。淮海战役的胜利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间存在深层的历史呼应。淮海战役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这一胜利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延续与验证。淮北从“百里煤城”到“湖上美城”的转型实践，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资源型城市的具体样本。从革命年代“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到建设时期“将乌金奉献给国家”，再到新时代“从黑灰煤

城到湖上美城”的绿色转型，淮北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特设主义主义认同的生成机制：它是内生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共享发展成果的历史实践之中，而非外部灌输的抽象理念。

二、大运河文脉与“五个认同”的文化涵育

大运河淮北段地处“扼汴河咽喉，当南北要冲”，在通济渠中位居中枢。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廊道，其在淮北的历史遗存，为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滋养。

一是运河网络中的民族交往。柳孜运河遗址作为通济渠的重要码头，是运河促进民族交往的典型物证。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涵盖南北多个著名窑口，北方青瓷与南方白瓷层层淤积于同一河道，深刻表明运河作为“民族走廊”，使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通过漕运、商贸、驻军等方式形成了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隋唐时期，西部、北部众多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大量内迁，运河沿线城市成为各民族汇聚交融的重要场域。柳孜遗址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淮北大地上的物质见证，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二是运河文脉中的文化交融。淮北运河文化兼具中原农耕文明与江南商业文明的双重特质，其语言、饮食、民俗、信仰的融合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地方缩影。临涣古镇的棒棒茶习俗“顺着大运河淌来”，茶梗本为下品，却在古泉水沏泡下形成独有味道，正是文化在交融中创生新质的生动写照。柳孜遗址出土瓷器上见有墨书诗文，南北窑口的工艺风格与审美趣味在运河沿岸汇聚碰撞，形成了超越地域的文化共识。这些文化遗存表明，中华文化认同并非对单一文化形态的确认，而是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对“一体”的深刻体认。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运河文脉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心理基础与情感纽带，使“五个认同”在历史文脉的滋养中获得持久而深沉的精神支撑。

三、淮北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

淮北“五个认同”的生成机制表明，认同的建构既依赖历史记忆的激活与与文化文脉的涵育，也依赖现实交往实践的持续塑造。从红色资源的载体化运用，到运河文脉的教育化转化，再到城市转型成果认同化表达，淮北正在探索一条“以资源涵育认同、以认同凝聚力量”的实践路径。

一是红色资源的认同教育功能。红色资源是“五个认同”教育中最具政治穿透力的载体。淮海战役纪念馆、总前委旧址等红色基地，不是静止的历史陈列，而是激活政治认同的“情感装置”。其教育功能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历史场景的还原与情感共鸣的唤起，使参观者完成从“感知历史”到“内化精神”的转化。红色记忆的代际传递尤为关键，青少年在“信仰的力量”“人民的选择”等主题引导下理解“小推车”背后的民心逻辑时，“五个认同”便从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细节，政治认同在情感共鸣中完成初步建构。

二是运河文脉的认同涵育功能。如果说红色资源为认同提供了“刚性的政治锚点”，运河文脉则提供了“柔性的文化滋养”。柳孜运河遗址与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认同教育的空间载体。其独特价值在于，运河文脉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地方性体验，青少年在遗址前感受千年舟楫往来的盛景时，中华文化认同便在体验中自然生成。运河文化带建设则将认同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城市空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不仅依靠课堂教学的“灌输”，更获得文化空间的“浸润”。

三是城市转型的认同凝聚功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建设者在矿区社区中共同劳动、比邻而居、互通婚姻，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微观层面的生动现场。从“黑灰煤城”到“湖上美城”，淮北的生态转型不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一次道路认同的集体重塑。当一个曾经“因煤而困”的城市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道路认同便不再是理论命题，而成为可感知的生活体验。生态转型由此成为“五个认同”中最具说服力的“实践论据”，它使人民在“家园变美”的切身感受中，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层认同。

淮北“五个认同”生成于烽火与桨声的双重滋养：淮海战役铸就政党与祖国认同，运河文脉涵育民族与文化认同，城市转型凝结道路认同。三者刚柔相济，揭示出“五个认同”是历史、人民与实践的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宏大叙事引领，也需地方性知识深耕。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作者简介：陈郑云，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

法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围绕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群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落点。

在基层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核心引领，推动各类主体从“单兵作战”走向“协同共治”，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值得深入研究思考。

一、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条件

党建引领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通过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变得更加高效有序，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得到提升。因此，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是增强党组织领导力的内在要求，是提升党基层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是践行党的执政宗旨的必然要求。

（二）提高人民幸福水平的基础保障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提升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有利于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社区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保证公共资源更加公平地分配到社区的各个群体，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各类治理机制的健全完善为支撑，是国家治理机制在基层层面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

二、当前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党组织核心引领效能有待提升

第一，部分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社区党员群体结构较为复杂，离退休党员、毕业待就业党员以及流动党员占比较高，党员群体时间、空间上较为分散，组织生活线上化现象较为普遍，线下参与度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组织生活实效，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第二，社区“大党委”统筹共建功能发挥不充分。尽管社区“大党委”共建架构已经普遍建立，但共建单位的联动多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部分结对共建单位对社区治理的实际需求把握不准，工作供给与社区现实需要存在错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力量下沉流于形式，难以充分依托共建资源高效回应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二）多元治理主体内生参与动力仍显不足

第一，居民自治参与意愿整体偏弱。部分社区居民对基层治理存在较强的依附心态，将社区公共事务简单归为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的责任，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不强，多数居民只有在收到社区动员通知后才会选择性参与公共事务，自主自发参与社区治理的群体占比有限。第二，网格员队伍履职功能不足。网格员多身兼多项基层事务，工作繁杂，配套激励保障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兼职网格员对岗位职责边界认知模糊，专业化业务培训供给不足，职业认同感不强，队伍稳定性面临挑战。

（三）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治理效能受限

第一，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各类治理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常态化协同运转模式，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群众团体等力量多处于分散运行状态，主体之间的协作大多集中在重大节庆、专项活动等特定节点，日常状态下相互联动、资源整合不足，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治理合力。第二，治理信息互联互通水平不高。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建设存在不平衡现象，已搭建的数字化治理载体平台大多局限于辖区内部闭环运行，跨街道、跨部门之间尚未打通数据壁垒，不同平台之间缺乏有效对接，治理信息资源难以实现共建共享。

三、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持续增强基层党建的核心引领能力

一是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形式。通过联合、分类等形式，结合实际组建“网格党支部”“小区党支部”“楼宇党支部”“商贸市场党支部”，设立楼栋党小组、兴趣党小组、党员责任区等，推动党支部有效嵌入各类社会组织和网格，确保党的工作不留“空白点”。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通过提高薪酬待遇、出台支持政策，从机关公务员、事业编制干部和社区业务骨干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担任社区书记。

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全面领导。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特别是社区党委负责人定期到辖区内部调研办公制度。四是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发扬“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示范作用，发动党员干部踊跃参与社区各项志愿服务活动，让党员干部成为社区发展的骨干，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

（二）全面激发多元协商参与的主观能动性

一是培育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积极引导政府、居委会、公益性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中。进一步探索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型组织体系与“多元共治+公众监督”式管理机制，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二是增强居民的自治意识。引导社区居民加强自我管理与服务，通过意见箱、公开栏、问卷调查、民需访谈、线上留言板等形式广泛征集民意，帮助科学决策。

三是促进居民间交流互动。优化现有治理服务流程，利用互联网平台协调各类社会资源，构建居委会、党员干部、先进个人、社区志愿团体、相关企业代表等多元主体服务协商机制，确保自治主体有序参与治理，打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四是探索建立“多岗合一”的网格员身份和报酬制度。将网格员工作量适合、工作内容相近的岗位进行“多岗合一”整合，并将各岗位补贴叠加发放，既提高待遇，又有利于增强工作责任感。同时，加大对网格员的绩效考核力度，增加绩效补贴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提高网格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三）创新驱动多元协同联动共治的能力

一是创新社区治理新模式。整合区域资源，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建立多元主体沟通协商机制与平台。制定和完善多元主体沟通协商议事规则，设计合理便利的沟通协商流程，清晰界定沟通协商事项的范围。搭建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协商平台，实现信息的及时推送、共享和应用。三是提高多元参与管理精细化水平。深化治理主体责任落实，以诉求满足为目标，吸引非社区单位与个人参与社区治理，强化资源支撑，形成“社区+企事业单位利益捆绑体”。同时，建立健全智能化数字社区管理体系，提高社区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四是提升网格化服务效率。建立社区民意反馈平台，探索建立“网上服务超市”“微信服务平台”等模式，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社区服务，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

（四）建立健全民意反馈与回应的治理机制

一是建立有效的居民代表制度。打造“民意诉求、代表反馈、分级置办、过程追踪”的全程闭环意见反馈体系，街道办将人大代表工作主动纳入街道社区治理“一网统管”工作中，提高城区运行、管理类社情民意的处置效率。二是建立多元化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协商制度，及时准确地公开社区公共事务信息，打破信息壁垒，避免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沟通障碍，实现治理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对话，使社区治理更加民主和透明。三是制定详细的社区建设规划。通过明确社区的长远发展目标、中短期治理计划和任务分解，逐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建立涵盖民情收集点、政策宣传点、互助帮扶点、纠纷调解点的社区民情反馈机制。

四是成立社区管委会等监督机构。加强对社区治理程序和结果的监督与管理。吸纳“一社一法律顾问”律师、“红色物业”、政法干警等力量形成一支专群结合的基层治理服务队伍，深入推进组织下沉，推动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作者单位：淮北市委党校）

谢子悦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